

馬 克 思  
法 兰 西 内 战

第 二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的雷鳴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資產階級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員會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統治階級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經了解到：由他們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經到来……他們已經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們必須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絕對的权利。”<sup>62</sup>

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軍、警察、官僚、僧侶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資產階級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領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紀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紀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淨，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

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則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sup>①</sup>。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

---

<sup>①</sup> 1871年德文版中，这句话的末尾稍有改动：“国家政权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编者注

証明，他們可以安心让資產階級“共和黨人”去担負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務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錢實惠。但是，資產階級共和黨人在建樹了他們唯一的六月勲業以後，不得不从秩序黨的前列退居後列；而秩序黨是一個現在已經和生產者階級公開對抗的占有者階級中所有一切敵對黨派組成的聯盟。他們共同管理的最適當形式，原來是由路易·波拿巴任總統的議會制共和國。這是一種公開實行階級恐怖和有意侮辱“賤民”的政體。据梯也爾說，議會制共和國“使它們〈統治階級的各個派別〉最少分裂”，可是它在这个人數很少的階級和這個階級以外的整個社會機體之間挖成了一道鴻溝。在以往各個政府下面，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還使國家政權受到相當限制，而現在由于這個階級的聯合，這種限制已經消失了。由于存在無產階級起義的威脅，聯合起來的統治階級已在殘酷而無耻地利用國家政權作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但是，統治階級對生產者大眾不斷進行的十字軍討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賦予行政機關以愈來愈大的權力來鎮壓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漸剝奪它自己的議會制堡壘（國民議會）用以防范行政機關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這個行政機關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統治階級的代表們驅散了。第二帝國原是秩序黨共和國的自然產物。

這個以 coup d'état [政變] 為出生証書，以普選為批准手續，而以寶劍為王笏的第二帝國，聲稱它倚靠農民階

級，即倚靠沒有直接卷入勞資鬥爭的廣大生產者群眾。它聲稱它以破壞議會制度，從而破壞政府對有產階級的公開屈從狀況而拯救了工人階級。它聲稱它以支持有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經濟統治而拯救了有產階級。末了，它還聲稱它已經把一切階級團結到復活了的国家榮譽的幻想周圍。事實上，帝國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喪失治國能力而工人階級又尚未獲得這種能力時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全世界都歡迎這個帝國，認為它是社會救主。在它的統治下，資產階級社會免除了各種政治牽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夢想不到的高度發展。工商業擴展到極大的規模；金融詐騙慶祝了自己縱橫世界的歡樂；民眾的貧困，在卑鄙無耻的驕奢淫佚的景象對照下，顯得格外刺目。看來高高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国家政權，實際上正是這個社會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齷齪事物的溫床。普魯士本來渴望把這種統治制度的重心從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卻把這個国家政權的以及由這個政權拯救了的社會的全部腐朽性盡行揭穿了。帝國制度是那由新興資產階級社會作為擺脫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來，爾後又由已經充分發展的資產階級變成了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的國家政權的最淫賤和最後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巴黎無產階級用以歡迎二月革命的“社會共和國”口號，不過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種不僅應該消滅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應該

消灭阶级統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駐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議會”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遺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組成的国民自卫軍。必須使这件事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軍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負責，随时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議會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換的負責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員，都只应領取相当于**工人工資**的薪金。国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給他們的办公費，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連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創議权都已轉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軍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侶势

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 *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

該交給公社的官吏，即交給那些嚴格負責的官吏。民族的統一不是應該破壞，相反地應該借助于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應該通過這樣的辦法來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却脫離民族、駕于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舊政府權力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鏟除，而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駕于社會之上的權力那里奪取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仆。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正如個人選擇的權利為任何一個工廠主服務，使他們能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一樣。大家知道，企業正像個人一樣，在實際業務活動中總是能夠把適當的人放到適當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時會犯錯誤，也總能很快就糾正過來。另一方面，用等級授職制<sup>63</sup>去代替普選制是根本違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歷史創舉通常遭到的命運就是被誤認為是對舊的、甚至已經過時的社會生活形式的抄襲，只要它們稍微與這些形式有點相似。於是這個摧毀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公社，也就被誤認為是在這個國家政權產生以前存在過並且後來構成這個國家政權基礎的中世紀公社的復活。公社制度被誤認為是企圖用孟德斯鳩和吉倫特派<sup>64</sup>所夢想的那種許多小邦的聯盟，去代替在各個巨大民族那里

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統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間的对抗状态被誤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統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貪污腐敗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議會議員，城市里凶狠的济貧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贅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給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經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侖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虛假統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統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証他們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東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鉄血阴谋之外，經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給“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sup>65</sup> 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 1791 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魯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貶为普魯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輪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sup>①</sup>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sup>②</sup>，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說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

---

① 1871年和1891年德文版为“军队”。——编者注

② 1871年和1891年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

人解放的話，可是只要工人們在什麼地方斷然當家做主，那些替兩極即資本和僱傭奴隸勞動（土地私有者現在只是資本家的馴順伙伴）對立的現代社會辯護的人，立刻就彈起辯護的調子來反對他們。仿佛資本主義社會還處在童貞和白璧無瑕的狀態！仿佛它的對立現象還沒有發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還沒有被揭穿，它的淫亂的實況還沒有盡行暴露！他們叫喊說，公社想消滅構成全部文明基礎的所有權！是的，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權。它曾想剝奪剝奪者。它曾想把現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剝削勞動的工具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本變成自由集體勞動的工具，以實現個人所有權。但這是共產主義，“不可能的”共產主義啊！然而，統治階級中那些頗為聰明而能領悟到現存制度不能長存下去的人們（這種人並不少），已在令人厭惡地、大聲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產。如果合作制生產不是作為一句空話或一種騙局，如果它要排除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總的計劃組織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制止資本主義生產下不可避免的經常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的痊癱現象，那末，請問諸位先生，這不就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嗎？

工人階級並沒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蹟。他們並沒有想 *par décret du peuple* [靠人民的法令] 來實現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得自己的解放，同時達到現代社會

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长期的斗争，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階級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滿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們能用鄙視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謾罵，回答好心肠的資產階級空談家的訓誡，这些資產階級空談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講其不学无术的濫調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sup>①</sup>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环境下虚心、誠懇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們所得报酬的最高額，据科学界一位权威<sup>②</sup>說，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額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紅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簡直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階級被公认为能够發揮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階級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資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階級的广大阶层——小販、手工业者和商人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階級內部紛爭起因的債权和債務問題，因而拯救了这个階級<sup>66</sup>。

---

①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即有产階級”。——編者注

② 在德文各版上这里加有：“（赫胥黎教授）”。——編者注

中等階級的這一部分人在 1848 年曾參加鎮壓六月工人起義，可是隨後制憲議會立刻就毫不客氣地把他們交給債主們去任意宰割了<sup>67</sup>。可是，他們現在靠攏工人，還不只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感覺到他們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麼招牌的帝國之間決定取舍。帝國大量盜竊社會財富，庇護大規模的金融詐騙，人為地加速資本集中並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階級遭受剝奪，使他們在經濟上遭到破產。帝國在政治上壓迫了他們，用狂歡縱飲從道義上激怒了他們；帝國把教育他們子弟的事情交給 *frères ignorantins* [無知兄弟會]<sup>68</sup>，從而侮辱了他們的伏爾泰思想；帝國激怒了他們的法蘭西人的民族感情，因為它把他們驟然推入了這次造成許多災難而結果只落得帝國顛覆的戰爭。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顯宦和資本家那幫 *bohème* [流氓] 從巴黎逃跑以後，以共和聯盟<sup>69</sup> 名義出面的中等階級真正的秩序黨，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幟下面，並且反駁梯也爾的誣蔑，保衛公社。至於這一大部分中等階級的感激心情能否經得住目前的嚴重考驗，將來自會知道。

公社對農民說，“公社的勝利是他們的唯一希望”<sup>70</sup>，這是完全正確的。從凡爾賽發出而由著名的歐洲報界僱傭文丐傳遍全球的最駭人聽聞的謊言，就是硬說“地主議員”代表法國農民。試想一想，法國農民對於他們在 1815 年以後不得不付予 10 億賠償金<sup>71</sup> 的人們竟產生了愛戴

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們 1789 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 年，资产者們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 45 生丁的附加稅，但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做的；而现在他們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們約定要付給普魯士人的 50 亿賠款的主要重担轉嫁到农民身上。相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經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負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稅，一定会給他們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們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們負責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們血液的公証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們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橫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們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們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們会发觉，給教士的款項如果不由稅吏們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愿捐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統治——也只有这种統治——能够直接帶給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所以这里用不着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須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的更复杂和真正切身的問題，如关于像梦魇一样压在农民小块土地上的抵押借款問題，关于日益增多的 *prolétariat foncier* (农村无产阶级) 問題，关于农民本身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資本主义农业經營的競争而日益加速受到剝夺的問題。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颁布的一切法律<sup>72</sup>，据它自己承认，都是反对农民的。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而且实质上是和“地主議員”的意向敌对的）幻想，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照顾呢？

“地主議員”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

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诈骗勾当的节日。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掠夺法国人

民的勾当。甚至在目前，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和因它阴谋勾结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间的空隙中，乘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sup>①</sup>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肮脏勾当。公社则对波兰的英雄儿子<sup>②</sup>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者。为了更鲜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波拿巴军队，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sup>73</sup>。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纳入

---

① 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

② 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

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围的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们在欧斯曼<sup>①</sup>庇护下不知盗窃了巴黎多少财物，所以公社没收他们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霍亨索伦王室和英国寡头执政者们虽然都靠掠夺教会得到大批财富，但是对于只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8 000法郎的公社，当然还是要大发雷霆。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残暴的措施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其规模远胜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句话，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叱声把他压下去，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

---

<sup>①</sup> 欧斯曼男爵(Haussmann)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塞纳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长官。为便于镇压工人起义，他曾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巴黎街道等的工作。(弗·伊·列宁主编的1905年俄译本注。)——编者注